



文學評論
丛刊

第5卷
第2期

南京大学中文系
《文学评论》编辑部 主办
南京大学出版社

《文学评论丛刊》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周勋初	叶子铭	钱中文	
副主编	赵宪章	王保生	丁帆	张宏生
编 委	丁帆	王保生	叶子铭	刘健屏
	许志英	朱建华	张宏生	杨正润
	周 宪	周勋初	赵宪章	胡星亮
	莫砺锋	钱中文	钱林森	徐兴无
	黄小初	董 健		
执行编委	徐兴无			

目 录

从《尚书·尧典》等篇看早期历史叙事文体的特征

..... 于雪棠(1)

唐初文馆与初唐诗风

——兼论初唐诗歌发展缓慢的原因 罗时进(14)

高适、岑参与河西、陇右边塞

——关于盛唐边塞诗的若干认识 张三夕(32)

论杨万里的散文创作成就 张瑞君(48)

《个山遗集》与晚明文学女性的生活空间 张 雁(62)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的主题学思想 王 立(76)

读周作人 钱理群(90)

谑而不虐：论语派小品文幽默风格论 杨剑龙(114)

鲁迅的虚无心态与启蒙精神 张 典(130)

“无从驯服的斑马”

——论沈从文的“个性主义” 王继志(140)

废名：走向古典艺术精神的深处 徐肖楠(151)

女性批判：当代中国男作家的男权话语 盛 英(169)

地域文化的持守与二月河的历史小说 刘 克(185)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著的几点思考 陆耀东(195)

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断代问题 葛红兵(207)

话语概念的意义沿革

——兼谈话语理论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艾秀梅(217)

从可读文本到可写文本

——兼论西方二十世纪文本理论的转型 李玉平(231)

从艺术的合法性问题看解释学美学与存在论美学的

内在关系 李鲁宁(239)

都鄙概念的生成及其文学内涵和艺术显现 李炳海(255)

文化交流中的学科建构

——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产生 曹 晋(269)

上帝与爱欲

——《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臆解 张 辉(281)

平民英雄的神话

——卢梭自传作品的一种解析 孙伟红(305)

“具有审美价值的完美现实幻景”

——论巴赞的电影表现观 胡星亮(315)

Content

1. Viewing The Styl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rly Historical Narration While Reading Articles Like “Shang Shu. Yao Dian”	Yu Xuetang(1)
2. Literary House And Poetic Style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On The Reason Why Poetry Developed Slowly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Luo Shijin(14)
3. Gao Shi, Cen Shen and Borderland Villages Along the West Side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Right Side Of Gansu Province ——About Frontier Fortress Poetry in the Flouring Age of the Tang Dynasty	Zhang Sanxi(32)
4. On the Creative Achievements of Essays by Yang Wanli	Zhang Ruijun(48)
5. “Posthumous Work of Ge Shan” and the Life Space of Literary Females in the Late Min Dynasty	Zhang Yan(62)
6. The Thought of Theme Study in the Fiction Research on the Ancient Chinese Novels	Wang Li(76)

-
7. Reading Zhou Zuoren, the Famous Writer Qian Liqun(90)
8. Teasing without Embarrassing: On Humorous Style of the Essay by the Language Commenting School Yang Jianlong(114)
9. Lu Xun's Nihilist State of Mind and His Enlightening Spirit Zhang Dian(130)
10. "Tameless Zebra"
—— On Sheng Chongwen's "Individualism" Wang Jizhi(140)
11. Fei Ming: Going Deep into the Classic Art Spirit Xu Xiaonan(151)
12. Criticism By Females: Contemporary Chinese Male Writers' Discourse on Male Rights Sheng Ying(169)
13. Regional Culture Maintenance and Historical Novel By Er Yuehe Liu Ke(185)
14. Pondering Over Books on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Lu Yaodong(195)
15. On the Dynastic Problem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istory Ge Hongbing(207)
16. Evolution of the Meaning in Discourse Concept
——The Influence of Discourse Theory on Literary Comments Ai Xiumei(217)
17. From Readable Text to Writable Text
—— The Switching Type of Western Text Theory in the 20th Century Li Yuping(231)

-
18. Approaching the Inner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lanatory Study
Aesthetics and Existence Study Aesthetics in the Sense of the Legitimacy of Art Li Luning(239)
19. Emergency of the Concept of Magnificence and Vulgarity and Its
Literary Connotation as Well as Artistic Expression Li Binghai(255)
20. Subject Construction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Study Cao Jin(269)
21. God and Eros
—— A Commentary on Herman Hesse's Narziss and Goldmund Zhang Hui(281)
22. The Myth of the Hero of Common Birth:
an Interpretation of Rousseau'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Sun Weihong(305)
23. "Perfect Realistic Illusion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n the Expression Concept of Ba Zan's Film Hu Xingliang(315)

从《尚书·尧典》等篇看早期历史叙事文体的特征

于雪棠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散文集，包含多种文献种类，在古代文体史上，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尧典》、《禹贡》、《金縢》和《顾命》四篇文章，在体制上与《尚书》其他篇章明显不同。其他篇章在文体构成因素的功能效应层面十分突出，而这几篇在文体构成因素的结构体制层面特征鲜明。其他篇章更多地具有说（口语）的色彩，而这几篇更多地具有写（书面）的特征。其他篇章更多地是与历史同步进行的现场片断式记录，多为经验之事实，而这些篇章更多地是晚于历史发生的事后对系列事件的综合整理与追述，不乏合理之推想。更重要的，从叙事与记言层面考察，《尧典》等文本属叙事文体，表现出早期历史叙事文体的一些特征。

一 叙事与记言

我国史家很早就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将历史记录的对象分成言与事，史官也分为左史和右史，分掌记言、记事。《尚书》从总体上看是以记言为主体，这毫无疑问，但是其中有几篇体制比较特殊，超出了记言体的界限，应当视为叙事文体。

从叙事与记言在文本中所占篇幅考察，《尧典》等四篇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全篇没有任何记言之辞，《禹贡》属此类；二是既有记言，也有叙述，《尧典》、《金縢》和《顾命》三篇除诰命祷祝之

言,还有大量叙述。《顾命》属叙述的文字有 600 多字,记言 200 多字,明显以叙述为主。《尧典》和《金縢》记言和叙事文字量大致相当,《尧典》记言 883 字,叙述 789 字。《金縢》叙述 269 字,记言 299 字^[1]。统计可能不十分精确,但大体可以反映问题。从篇幅上看,《尧典》和《金縢》这两篇的记言与叙述基本上平分秋色,记言还略多于记事。如此看来,似乎《尧典》和《金縢》的叙事性质应受到质疑。可是,仅从文字量上判断文本叙事和记言的性质,是不尽可靠的。正如法国的叙事学家热奈特所言:“史诗作品中无论对话或直接引语占多大份量,即使它超过叙事的份量,史诗也仍然以叙述为主,因为对话必然由叙述引入,并夹在叙述部分之间。”^[2]他说的尽管是史诗,但这个观点对于历史散文仍然适用。《尧典》等篇中的记言,就是如此。

《尧典》、《金縢》和《顾命》三篇文本,在总体的叙事框架中,包含其他种类的记言文体。《尧典》包含“命”体文。如尧命羲氏与和氏制历法,“帝曰:‘咨! 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舜任命九官,也采取了同样的叙述方式,在文体形态上,可以划分出多个短小的命体文。《金縢》有周公祝祷辞,《顾命》包含两段“诰”体文,成王遗命与康王之诰。“命”、“祝祷”、“诰”体,都属记言体,而这些记言均是由叙述引入,并夹在叙述部分之间的。

那么叙事与记言是什么关系? 叙事与记言存在双向渗透的关系。记言散文的成熟与发达要早于叙事体散文。处于历史叙事文体发展的早期阶段,叙述不免受到记言的影响,带有浓厚的记言痕迹。《尧典》、《金縢》及《顾命》中包含的大量记言文字体现出记言向叙事的渗透。然而,尽管如此,叙事体文本中叙事的统帅、主导地位却不可否认。叙事在接受记言的渗透的同时,还强有力地主宰、干预了记言,叙述者不仅以叙事始,以叙事终,而且在记言部分也表现出鲜明的介入意识,具有明确的叙事特征。《尚书》中的

记言体散文，有的直接以“某人曰”的形式完成全篇，没有叙述人的介入；有的在记言前有简短叙事，交代言说的背景，叙事是为记言服务的，而且在记言过程中，绝对不插入叙事。在叙事体文本中，即使在人物对话中，也随时插入叙事之笔，叙述者有一种随时介入的姿态。例如，《尧典》中舜任命百官时一大段记录任命之言中有这样几段。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

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斨暨伯与。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让于夔、龙。

“拜稽首”是动作，而“让于稷、契暨皋陶”当是以言说的方式表现出来。历史发生的原貌本来应当是一段对话，由于叙述者的介入，把最初的记言转变为对言的内容的叙述，用叙述的形式替代了对最初言语的记录。历史发生初始形态的人物语言以叙述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不是呈现出来。

叙事体文本中的记言部分承担着一定的功能，与在记言体中的功能不甚相同。除了记言本身所具有的以文字保存声音的记录历史功能之外，还具有其他两种功能：叙述功能和阐释历史的功能。

《尧典》中尧命与臣下放齐、欢兜、金、岳等人及尧与四岳的两组对话，属记言，通过这两段对话，我们得到的是对尧选官任能、治理洪水一事及尧选择继承人一事的认识。即，这两段是以对话形式完成对事件的叙述。《顾命》中成王遗命和康王即位诰，记言被组织进系列事件之中，在叙述中承担一定职责，使史官对事件的叙述显得完整，并且造成逼真的现场感及历史真实感的客观效果。

《金縢》中周公的祷祝辞表明周公祷祝的目的是以身代王，是

忠于王室的。这就为后面管蔡流言的诬陷性质,为天降灾异的神秘事件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天降灾异是因为周公受到了冤枉,当冤枉解除,灾异现象随之消失。记言不仅具有记录历史、再现历史的功能,在一系列事件中,记言被赋予了阐释历史、表现历史的功能。这段记言意在告诉人们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二 结构体制

人类的活动以时间和空间定位,因此,作为记录、叙述人类行为的历史文本,不可能脱离两大基本结构框架:按时间顺序或空间方位叙事。此外,面对历史,史官会思考为什么发生这些事件,前因后果是什么。所以,对事件间因果(逻辑)关系的追寻就成为历史文本的一个重要特征,以因果关系为结构框架的叙事文本也就很自然地产生了。《尧典》等四篇文本的结构体制就充分体现出历史叙事文本的三种主要类型。

一、事件按时间顺序逐次展现。《尚书》中《尧典》、《金縢》和《顾命》三篇,都是以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为叙事的基本结构线索。

《尧典》颂扬尧和舜的功德,记叙了二人所作的诸多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在时间上呈现为前后相继的线性链条形态。尧选帝位继承人时,明白声称“朕在位七十载”,这就为他所作事情划定了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记舜即位后的事功,大多有明确时间标示。“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既月乃日”,覩四岳群牧。巡守四方从“岁二月”开始,每隔三个月改换方向。此后的巡守以五年为期。文本后半部分对舜功业的叙述也依循时间的自然推进而推进。最后以几个时间来概述舜一生活动:“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三十岁被征召,任官三十年,在帝位五十年。

《尧典》的叙事，是以一定的时间段，或者固定的时间周期，还有具体的时间点，为一条基本的结构线索。尧舜所作各个事件之间，是并列（平行）关系，只有时间上的先后之别，不存在因果关联。

《金縢》叙述克商二年后，周武王病，周公祷，武王瘳，武王丧，周公受诬，居东二年，秋，天现灾异，成王启金縢，出郊迎周公，灾异现象消失。对这一系列活动的叙述，也基本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推进。文本有三处标明了时间。

《顾命》叙述成王将死，遗命，丧礼，康王继位仪式几件事，用明确的时间点标示出事件在时间流程中的演进。“惟四月，哉生魄”——成王生病；“越翼日乙丑”——成王辞世；“越七日癸酉”——准备好丧礼；成王崩后第八日——史官举行册命康王即位的典礼，并发布诰命。

二、功绩在空间秩序的建构中完成。《禹贡》与《尧典》等三篇不同，它记载禹布土、开山、导水的系列功绩，禹的行动主要在空间中展开，文本也以空间秩序作为结构框架。禹的功业可分为三个大的行动单元。第一个行动单元是依自然地理空间形势分别九州，考察每地的物产、土壤，确定贡赋。第二个行动单元是治理九条山脉，开通道路及疏导九条水系。第三个行动单元是以五百里为空间界限划分五服行政区，制定贡赋。最后划定纳入统治的空间范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行迹所至，声教所达，东西南北四方的界限，表述得很清楚。禹的功业在空间秩序的建构中实现，文本也依次展开，描绘出清晰的自然地理与政治区划治理相结合的完整国家图式。

禹的功业果真像《禹贡》所记那样盛美有序吗？尽管司马迁的《夏本纪》里全数收录《禹贡》所载事迹，以为信史，但后世的历史学家多对此表示怀疑。认为禹的事迹如尧舜一样，经追述而加入了理想化成分。“《禹贡篇》内所叙导山和导水的办法，固属张

大其辞，把春秋战国时候所知道的（如黑水）山水完全叙述一遍，不是大禹时代所能有的事实。”^[3]《禹贡》中到底有多少事实，有多少想象，古史茫昧，难以确考，也不是本文要探讨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禹贡》展现的空间秩序，是历史事实加上想象而建构出来的。

三、解释通过因果框架而实现。《尚书》中几篇叙事体文本，最特别的要数《金縢》，它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金縢》所记诸多事件不仅随时间推进而逐次展现，而且，它们还被安排在一个因果链条上，事件间的因果联系被强化、突显出来。逻辑关系是《金縢》一个极其重要的结构框架，事件在系列中承担着或为后事之因、或为前事之果的叙事功能。武王生病——周公祝祷——周公锁册——管蔡流言——周公居东——禾尽偃——成王启册、出迎——禾尽起。一系列事件被安置在一个因果框架之中，形成紧密的因果链条。

《金縢》通过因果关系的组织，解释了历史现象。为什么周公会受诬？因为祝祷词被锁于金縢，外人不能得知真相。为什么会出现雷电交加禾偃木拔的灾难？因为周公受了冤枉，天为其彰德。为什么禾偃后又能尽起？因为成王开启了金縢，周公冤情大白，得到公正待遇。等等。不管对历史现象的解释是否正确，但撰述者的的确提供了对历史的理解。

虽然叙事文本可以比较明确地分别归类到时间顺序、空间顺序及逻辑关系这三种基本结构框架类型中，但是一个文本的结构，有时不只是按照一个框架组织，而是会同时容纳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不是互不相容，格格不入，而是呈现为相互交织的状态。

有的文本总体构架为双重结构。《金縢》以时间为经，以因果为纬，是时间序列与因果关系并行的双重结构。《禹贡》空间秩序为显，时间序列为隐，开篇云“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结尾“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工作从开始到结束，虽然没有具体的时

间词汇出现,但隐伏着一个由开始到结束的时间段。

有的以时间序列为主架,局部为空间叙事结构。《尧典》和《顾命》都有这样的特点。《尧典》总体结构以时间为序,其中叙述舜巡守一段就遵循东南西北的空间顺序进行。《顾命》以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为总线,至于祖庙器物的陈设及卫士位置几段,则按照空间方位进行陈述。牖间南向,西序东向,东序西向,西夹南向,西序、东序,西房、东房,各有什么珍贵器物,不同种类的四种宝车各停在什么位置,卫士站守在什么位置,以东西、左右、内外划分空间,叙述得井井有条。根据文本的叙述,我们完全可以画出准确的图示。看上去,这些空间顺序的叙述有些类似于描写,其实,它们担负的是叙事作用。如热奈特所言:“由于描写停留在同时存在的人或物上,而且将行动过程本身也当作场景来观察,所以它似乎打断了时间的进程,有助于叙事在空间的展现。”^[4]

不同的结构体制形成不同的叙事模式。《尧典》等四篇文本有两种叙事模式:大事记模式和故事模式。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大事记模式没有矛盾冲突,构不成情节,事件间也没有因果关系;而故事模式则有冲突,构成情节,事件间具有因果关系。《尧典》、《顾命》、《禹贡》都属于大事记模式,而《金縢》则属于故事模式。“历史学家在研究一系列复杂的事件过程时,开始观察到这些事件中可能构成的故事。当他按照自己观察到的事件内部原因来讲述故事时,他以故事的特定模式来组合成自己的叙事。”^[5]《金縢》的叙述者就是这样。在叙述中,他流露出有意识地要讲述一个故事,而不只是陈述一系列历史事实的明显倾向,叙述者是以故事模式来进行叙事,事件被放置在情节结构的范畴之内。无论是故事模式还是大事记模式,都显示出史官对事件的裁别能力,以及围绕一个中心(人或事件)组织史料的能力。

有没有什么内在的原因,促成了文本结构体制的形成?答案是肯定的。《尚书》为政治文件的汇编,文本的结构体制受到撰述

者的政治理念与历史人物政治行为的驱动。

尧舜禹时期，年代最为久远，而其历史文献资料也最为阙如，然而，由于“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6]的心理，在后人的印象中，他们最为崇高。史官有意识地建构一个崇高、伟大的尧舜禹时代，用文字书写出一个完整的、秩序井然的政治图景。与建构一个秩序井然、包罗万象的政治图景追求相一致，于是，在书写有关尧舜禹的事功时，文本的结构也体现出相应的特点。

《尧典》有宏大、均齐的结构特点。全文叙述尧和舜二人的行事，时间跨度大，记述事件多，综观全局，人物众多，总体的叙事体制包含命体文的雏形，包含谟体文的形态，结构是宏大的。尧的登场先是叙述事功，随后接以几段对话。对舜一生大事的写法也是如此。文本整体上比较均衡，对称。虽然这对称并不那么精确（尧事功较少，篇幅短些；舜事功较多，篇幅略长），但大体上是对称的。文章的某些部分如尧命天官四位，舜巡守四方两段，句式极其整齐，给人感觉有如一个四方形。而四方形的结构十分端正，法度森严，这样的文本结构有助于促成一种记录崇高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崇高文体。《禹贡》文本结构的宏大、整齐一目了然，无须赘述。

从《尧典》的资料来源与最后文本的内容与形态方面考察，《尧典》撰述者求全、求秩序的意识就更明确了。根据胡厚宣考证，认为《尧典》中的四方名来自甲骨文，并且将其中的神话材料改造成为人事历史资料；杨树达、于省吾二人都指出，直到《尧典》中才把四方和四时相配。刘起釪根据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等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考辨，认为《尧典》中的四位天文官（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包括羲和在内，其实在甲骨文中几人的情况并不像在《尧典》中那样，而且四位官员的任务，是《尧典》作者据殷代甲骨文的祭日资料而改编，并把他们分派在不同季节里。关于鸟火虚昴四星定季节，据竺可桢、于省吾的天文研究，《尧典》中的天

象不能早于商代,不可能是尧时的。^[7]如此看来,《尧典》撰述者运用的材料多为文献中所存,但在编撰中渗入了主观的政治理念是无可怀疑的,他要建构一个包裹宇宙的秩序世界,并采取了与此相应的文本结构。

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使无序的世界走向有序,禹开疆拓土、命名制赋这些给世界以秩序的行动在文本结构上也得到充分显现。《禹贡》除表层的空间顺序结构外,还有深层意蕴结构——扩展式结构。文本叙述禹的工作从冀州开始,冀州,在今山西与河北西部,是当时的政治中心,然后,推及其他八州,向北、向南、向西扩展。禹对政治区域的划分也是如此,以政治中心所在地为圆心,以五百里为单位向四周逐层扩展。这种扩展式结构是政治上主名山川,开疆拓土行动的直观呈现。

三 语言风格

研究《尚书·尧典》这几篇的语言,是个既重要又十分棘手的问题。因为《尧典》等篇文本的形成不尽是与历史同步进行的实况记录,大多经过后代史官的整理加工,其语言既有当时体,又掺杂后代的特征,成分比较复杂。这里不过细地梳理不同时期的语言特点,仅从一个角度进行分析。

“如果是一篇完全忠实的历史叙事,史学家—叙述者从叙述完成的行动转为机械地记录所说的话语时应敏锐地感到表达方式的变化,……把行为和话语想象出来是同一种精神活动,那么把这些行为和话语‘说出来’则是两种十分不同的语言活动。”^[8]《尧典》等四篇文本的语言就存在这种情况,可分为叙事语言与人物语言(独语或对话)两种。《禹贡》全篇都运用了叙事语言,故而其风格统一,整齐、简明、质正。《尧典》等三篇既有叙事语言,也有人物语言,因此全篇语言风格不甚统一。

叙事语言基本属于书面语的性质，具有整齐的特点。《尧典》中开头“曰若稽古”一段，命羲和等四人制定历法一段，叙述舜的品德及接受考察一段及舜即位后进行祭祀、巡狩、划州界、定刑法、惩四凶几段，都属叙述人语言，这些语言句式大多比较整齐，以四言为主，且多用排比。《禹贡》叙述禹治理九州、九山、九川，划定五服，每一部分中的每一段都遵循同一叙述句式，全文语言颇有整饬之美。《顾命》中叙述祖庙里器物陈设和卫士情况，语言也非常整齐。

整齐并不意味着呆板，整齐之中还富于变化。《尧典》中舜巡行四方一段，在详细记述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所做事情后，叙述舜到南、西、北三方巡守。文曰：“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舜在其他三方做事与在东方相同，但就是“如岱礼”这一个意思，叙述者没有运用同一语言加以表述，而是用“如岱礼”、“如初”、“如西礼”等几种形式。显示出叙述者刻意避免语句的重复，有意在整齐中求变化的意图。

此外，整齐中的变化，有时还出于意识形态的影响。《禹贡》叙述禹到九州考察，记叙禹在冀州和到其他八州的语言形态不同。八州，都运用“某河（地）惟某州”的格式：“济、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惟豫州”、“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唯独开头叙述冀州时不同，仅有“冀州”二字，在语言形态上与其他八州区别开来，显示出冀州独特的中心位置。

叙述语言具有简质刚正的风格，与《逸周书》的相关部分对照，其风格更加鲜明。

同样是叙述人物的位置及服饰，《逸周书·王会解》：“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为诸侯之有疾病者，……相者太史鱼、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堂下之东面，郭叔掌为天子孙录币焉，